



以色列的基布兹改革及其对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陈艳艳 王新耀^{**}

【摘要】基布兹是以色列特有的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世界上公有化程度极高的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基布兹自1909年诞生以来,对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发展贡献巨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布兹出现了发展危机,遭遇了劳动力流失、经济萧条、传统价值观体系崩溃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危机,基布兹通过改革职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用价值认同教育取代强意识形态教育等措施,使基布兹重新焕发生机。纵观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乡村经济发展拉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流失、农民主体意识不强等类似问题。分析基布兹的危机与改革可以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新农村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特有的公有制性质的社区模式,又被称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运动被称为以色列的“国之基石”,对以色列建国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居功至伟。自1909年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陆续建立了数百个基布兹,史称“基布兹运动”。早期的基布兹社区实行财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需分配制度,社区成员在平等与自愿原则下直接参与义务劳

^{*} 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以色列宗教基布兹运动研究”(项目编号:2020GN039),山东大学人文社科资金资助项目“以色列基布兹的危机与改革研究”(项目代码:12260082035304)阶段性成果。

^{**} 陈艳艳,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及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王新耀,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布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传统的集体主义模式遭到质疑,基布兹债台高筑,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失。于是,基布兹接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1世纪开始,基布兹改革初见成效,大部分基布兹发展稳定,成员的生活水平开始稳步提高。21世纪初,基布兹以占以色列3%的人口和36%耕地的规模,创造出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42%的工业产值。不仅如此,基布兹的大田作物、蔬菜和花卉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49%,供应了以色列所需的小麦、56%的牛肉和82%的棉花。基布兹的农产品出口占全国总出口量的43%,每年向欧洲出口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被称为“欧洲的冬季厨房”。这意味着基布兹在历经危机之后,再次成为以色列的“国之基石”。

一、基布兹运动及其主要成就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共产主义“细胞”,以色列基布兹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色列建国前伊休夫时期(Yishuv,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修建定居点)的社会实验。基布兹是极具创新性的社会实验,其最初目标是解决犹太复国运动期间在约旦河谷建立定居点的农业问题。^①在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浪潮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于1910年在加利利湖(Galilee Sea)南端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该基布兹最初只有七名成员,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财产并保卫自己的安全。这些成员期望通过开垦土地、生产粮食等方式来吸引更多的犹太同胞,为新国家的建立打好基础。他们坚信自己的行动正在为一个基于合作、平等和共同生活的崭新犹太社会奠定基础^②,理想是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平等、互助、宽容、人与人之间有着手足般情谊的新社会。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青年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到1920年,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共建立了10个基布兹。^③这些基布兹的最大不足是规模较小,且相互间缺乏合作。基于基布兹建设前十年的经验与教训,第一个大型基布兹“恩哈罗德”(En Harod)于1921年成立,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乡镇式的独立社会,消除城乡社会差距,最大限度地吸引新移

^① Dan Horwitz, Moshe Lisak, *Metzuket B'utopia* (Tel Aviv: Am Oved, 1990), p. 167.

^② Amir 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213.

^③ Henry Near, "Experiment and Surviv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bbutz,"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0, No. 1, 1985), p. 179.



民。到 1947 年建国前夕,以色列的基布兹数量增至 149 个。这些基布兹规模大小不一,成员人数从 60 人至 2000 人不等。这些基布兹所处的地理布局基本上定义了新生以色列国的边界。从地中海沿岸到约旦河谷,从南部沙漠到北部高地,这些基布兹是以色列建国的重要物质保障与地理版图基础。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数量进一步增长,截至 2012 年,全以色列境内共有 274 个基布兹,成员总数为 14.1 万人,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3%。

总的来说,基布兹的总体目标是建成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和睦民主的理想社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基布兹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全部为成员共同拥有,不单独属于任何个别成员或家庭。基布兹内部实行直接民主原则,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决策,通过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基布兹大小事务。所有基布兹成员都必须参与劳动,并且不管工作性质、技术水平和职务高低,成员所得待遇一律相同。基布兹是一种公社式的大家庭,在成员义务劳动的基础上,基布兹负责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子女养育等。基布兹是一种平等的、“以成员为导向”的组织形式,成员间能够产生合作与信任。它也是一种平行的、不按等级划分的组织形式,为成员提供更多承担责任、实施任务和参与展现的机会是成员行动的基础和准则。^①

基布兹不仅是犹太人积极进取、大胆无畏的开拓精神的象征,也是以色列的社会榜样和典范集体模式。基布兹人建立了一种基于完全平等与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构,它不仅为全世界的犹太人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生活,也为新国家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与精神条件。^② 因其独特的建设理念、组织结构以及体现出来的物质力量,基布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回归。基布兹通过吸收新移民与自身人口的增加为以色列的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必需的劳动力,以优秀的教育体系给以色列各个行业培养了诸多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不仅如此,基布兹通过持续的生产实践为以色列国提供主要的农副产品以及大量的工业基础产品。时至今日,以色列基布兹的年均农业总产值达到了 17 亿美元,而工业年均总产值约为 80 亿美元,是以色列的重要经济支柱。除此之外,基布兹在生态社区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健康与养老体系构建、国家安全防御等领域都有突出贡献,是以色列名副其实的立国之本。

^① Nir Tsu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ibbutz Social Capital, Voluntarism, and State-Community Relations: A Case Study,” in ECPR Joint Session of Workshop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April 2000), pp. 23-24.

^②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99.

二、基布兹的当代发展危机

尽管基布兹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大部分基布兹遭遇了巨大的发展危机。1985年,致力于全以色列基布兹合作、支持与交流的基布兹联盟名存实亡,以致基布兹只能依赖本身内部所生产的资料来生存发展,这对很多产业单一的基布兹是致命打击。紧随着基布兹中生活质量的下降,基布兹成员对基布兹前景逐渐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基布兹之外的地方去谋生,特别是到特拉维夫这样的大都市。这加剧了基布兹人口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恶化。^①同时,以色列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基布兹不可能获得国家的有力支持,也造成了基布兹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不景气。这对举步维艰的基布兹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从总体上看,以色列的经济危机只是基布兹生存危机的外因,其内因是基布兹实行了70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弊端的大爆发。基布兹所遭遇的发展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②:

第一,基布兹的劳动力流失。1985年以前,基布兹的人口流失大约为每年400人,1985年后上升到了每年约1000人。仅在1990—1997年,基布兹人口就减少了5.9%。造成基布兹人口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基布兹成员对基布兹分配制度的不满。基布兹追求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弱者或病者的有力保障,但是也易滋生新的不公平,出现“搭便车”(free riding)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③现象。有成员认为自己的贡献太小而不能左右分配,从而产生“搭便车”的想法,即希望自己尽可能少工作,以便不与基布兹整体的利益相关。这种做法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一方面每位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另一方面每位成员又都想在别人不搭便车的情况下来搭便车。但是每个人都认同当所有人都想搭便车的时候,每个人的情况都会变得更糟,这就导致了“囚徒困境”。

^①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Processes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institutionalization Among Israeli Kibbutzim, 1990-1998,"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August 12-16, 2000), p. 4.

^② 李勇 Li Yong,〈论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兴起与当代改革〉[On the Rise and Modern Reform of Israeli Kibbutz Movement],《犹太研究》[The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18年第15辑(2018, Volume 15), 128-130.

^③ Amir 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214.



“搭便车”现象造成了基布兹个体努力程度和整体的管理效果低下。另外，基布兹不讲究物质奖励与有效的工作激励的做法也容易造成成员们互相之间的不满，比如基布兹的老成员常抱怨新成员不像他们曾经那样努力工作。因此，一些成员认为在贡献和奖励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使物质动机合法化是必要的。其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布兹的集体主义特色不断消退，基布兹的新一代年轻人不再被这种特别的集体主义道德和信仰所吸引，他们生于基布兹却并没有对社区有着特别的信任与忠诚。很多年轻成员向往基布兹外边的世界，他们留在基布兹，仅是因为习惯于基布兹中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基布兹。

第二，基布兹的经济衰退严重。在1984年之前，基布兹工业生产总值占以色列工业生产总值的10%左右，到1984年则下降到了6%，甚至在1987年出现了不堪债务重负而破产的基布兹。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为维持其成员的正常生活水平，基布兹不得不靠银行或各种基金的借款来扩大投资，因此带来的债务问题就成了许多基布兹的共有问题。大多数基布兹都债台高筑，当时以色列的280个基布兹的总体债务承担超过40亿美元，平均每个基布兹成员要承担3.3万美元的资本债务。仅1982—1988年，基布兹的总负债额就增加了两倍。^①巨额债务不仅影响了基布兹的再生产，也使得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进一步加剧了基布兹人口的流失。

第三，基布兹中传统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的溃散。随后时代的发展，以色列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与市场自由化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的主导经济形态，但基布兹仍然实行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自由资本主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显而易见，从而导致了基布兹价值框架的溃散。紧随其后的是作为首要意识形态与道德规范的集体主义的动摇。越来越多的基布兹成员不再看重集体的意义，开始将自己定义为西方世界的工人。新型的工业生产也使基布兹生活参与度和社会平等面临严峻挑战，这些都使得基布兹价值减弱。^②此外，20世纪70年代开始，个人主义思潮在以色列迅速蔓延，受此思潮影响的基布兹成员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对以往的原则和理想产生了怀疑，成员的思想意识与基布兹传统的意

^① Amir 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p. 217-219.

^② Stephen Charles Mott, “The Kibbutz’s Adju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Ideological Decline: Alternatives for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 19, No. 1, Spring 1991), pp. 151-173, p. 158.

识形态渐行渐远,逐渐反对基布兹重集体而轻个人利益的传统。

三、基布兹的改革举措

为了摆脱困境与谋求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生产能力低下、市场前景低迷的基布兹在征得全体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宣告破产。那些未破产的基布兹则积极进行改革。改革的总体原则是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同时维持和保留基布兹的主要传统价值体系。改革后的基布兹大致可分为集体主义基布兹(The Collective Kibbutz)和改革派基布兹(The Renewing Kibbutz)两种。以色列现存的274个基布兹中以改革派基布兹居多,大约有190个。但无论是传统的共产主义基布兹,还是改革派的新型基布兹,其社会主义性质都没有根本改变。^① 基布兹改革中私有化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个人住宅产权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派基布兹虽然实施了“差别工资制度”,但同时也实施了收入“安全网制度”来保障每个成员的最低收入。在个人就业方面,改革后的基布兹在鼓励个人根据自己特长与兴趣自由择业的同时,也实施了就业保障制度。在无法实施个人选择性择业的情况下,基布兹有义务为成员安排相应的工作以保障个人的就业权利等。以色列政府根据基布兹的专业生产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比例对基布兹改革给予了多方位的帮助。^② 概括起来,基布兹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四个层面:

第一,进行基布兹的职业结构改革。针对按需分配制度所出现的弊端,基布兹进行了职业结构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允许基布兹成员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二是基布兹的部门管理人员可自主决定基布兹的雇佣与受雇对象。^③ 改革后,基布兹成员外出工作的现象越来越多;同时,外来的雇佣工人在基布兹工业整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20%上升至1997年的60%。^④ 考虑到成员对工作的满意度取决于他的工作动机,基布兹竭力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适应成员现有的工作能力、爱好以及潜能。与此同时,基布兹仍然保留了部分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这不仅能满足部分成员的工作期望,也能满足他们的经济需

^① Amir Helman, "The Israeli Kibbutz as a Socialist Model," i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Vol. 148, No. 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astern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Problems* (March 1992), pp. 168-183.

^② 同上, p. 177.

^③ Menahem Rosner, *Future Trends of the Kibbutz -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Changes* (University of Haifa, The Institute for Study and Research of the Kibbutz, Publication No. 83, 2000), p. 2.

^④ 同上, p. 2.



要。此外,基布兹的多数财务分配预算考虑到了成员的个人需要,并且成员和孩子年龄等因素也被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实行有差别的分配方式。

第二,对基布兹的所有制进行改革。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促使了基布兹进行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推进私有化改革,将一些原本由集体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了家庭与个人身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布兹的经济发展,帮助基布兹度过了经济危机,但是也打破了原本的完全平均主义机制。为了改善成员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基布兹不得不实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后,根据基布兹的私有化程度,可以将其分为集体主义基布兹、半私有化基布兹和私有化基布兹三类。^①私有化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基布兹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不同。甚至,有基布兹的公共生活都开始私有化,解除了基布兹在公共卫生保健、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基布兹,也依然保留着共有责任系统,其经济与财富原则上的所有者仍是基布兹。而且,基布兹中的重要决策依然实行民主表决,提案的通过仍需要得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成员的同意。尽管如此,改革对传统价值与生活方式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积极发展高科技的基布兹农业。基布兹利用独有的土地与淡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以求渡过危机。基布兹土地虽然划归国有,但通常基布兹从国家租赁的土地到期后,都会自动续约。作为自然水资源极度缺乏的中东国家,以色列的淡水资源也通常优先供给基布兹。基布兹改革时期的农业发展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全国基布兹和公共绿地的灌溉设施几乎都由政府的相关专业部门无偿铺设,政府投入到农业科研的经费也远高于世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40%以上的农业科研成果当年就能转化为生产力,成果转化效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②二是高科技农业的发展。以色列科学家不断研发适应以色列农业生产的高科技农业技术,诸如优化沙漠农作物品种、自动化的滴灌技术等,来促进农业优质高产。三是注重销售渠道的开发。以色列设有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专业调研与指导部门,对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国际市场需求反应灵敏。加之以色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系统,可以确保农产品以最佳的价格和最快的速度进入销售市场。

^① Dana Shapiro, Moshe Stchwartz and David Pearlmutter, “Collectiveness, Remoteness and Isolation as Factors in Kibbutz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Horizons in Geography* (No. 81/82, 2012), pp. 20-38.

^② 曾晓辉 Zeng Xiaohui,〈基布兹托起以色列〉[Kibbutzim Hold Up Israel],《企业文明》[Enterprise Civilization],2000年第2期[2020, Issue 2],44-45。

第四,用价值认同教育来取代纯粹的强意识形态教育。一直以来,强意识形态教育都处于基布兹教育的首要地位,旨在保证基布兹的新成员能够继承父辈的理念与价值体系。由于基布兹的内部改革以及趋同行为模式的削弱,现代基布兹成员逐渐从历史义务中脱离出来。^①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外来思想的影响,基布兹的年轻成员对基布兹传统原则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越来越低,意识形态教育的推进也日益困难。为此,基布兹加强了实践性的价值认同教育,旨在通过各种实践与教育活动,加强年轻一代的基布兹人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从而真正地欣赏与接受集体主义原则。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改革之后,基布兹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基本发展成了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的社区模式。在政府的宏观支持下,基布兹的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吸引了社会各要素的参与。此外,基布兹成员在互助合作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强化集体主义意识与认同教育。集体主义观念、主人翁意识与人民体验美好生活的幸福指数成了基布兹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诸如乡村经济发展拉动力不足、村民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农村人口流失以及需迫切解决的乡村养老问题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基布兹相关问题及改革举措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带来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针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乡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足问题,以色列基布兹对农业体系的改革经验值得参考。乡村经济发展拉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水平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及产业化程度不高。具体来说,我国农民人口基数大,耕地数量相对较少,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散。同一地区农作物种植统筹规划不足,种植作物多样但规模小,从而使得进行大规模种植的难度较高。农民仍然习惯于精耕细作的农业,导致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高科技农业的发展仍不成熟。不仅如此,大多数地区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部分地区存在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销售困难等问题。农民个体种植缺乏销

^① Stanley Diamond, "Kibbutz and Shtetl: The History of an Idea," *Social Problems* (Vol. 5, No. 2, Special Issue on the Kibbutz, Autumn, 1957), p. 84.



售渠道,且农村合作社与农民的契合度不高^①,他们从合作社了解到有关农产品种植技术与销售渠道的信息较少。

针对类似的问题,以色列基布兹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基布兹不仅进行了农业生产结构转型,还大力促进新型农业科技的发展,引进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在管理方式上,基布兹采用成果奖励等方式鼓励个人以其专业实践、经验为集体作贡献,通过奖励机制等方式引进有能力的农业管理、技术人员等进入农庄工作。改革后,每个基布兹中都有农业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直接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与咨询,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可以通过政策、资金照顾等方式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让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常驻乡间田野。另外,基布兹在改革中通过合作社与企业参股合作实现了基布兹的公司化改造。改造后的基布兹以公司的形式实现了不同基布兹之间多样的技术需求。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可以尝试发展农民间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安排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分区负责农业产区,通过细致化的对接管理来提高农业生产,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②此外,基布兹在产品尤其是农业产品上的快捷销售渠道是其高效农业的显著体现。新农村建设应该紧随时代潮流,利用网络与交通优势,拓宽销售渠道,使农产品在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力。^③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农业产区与企业合作的做法,如一些农业产区与电商平台合作,以双赢的方式提高农产品盈利,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方式能够快速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企业的优秀管理人才及社会资本为农民所用。最后,基布兹的现代化农业飞速发展所依靠的外部力量是以色列政府和全世界犹太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我国农村农业生产集体可以通过农民集资、社会募资、向政府申请、向企业融资等方式,购买先进的机械化设备与技术,发展高科技的机械化农业,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政府及各级农业研究机构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让政策与做法更契合农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地将农民吸

^① 段禄峰 Duan Lufeng,魏明 Wei Ming,〈以色列基布兹农业合作社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of Israeli Kibbutz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世界农业》[World Agriculture],2017年第11期[2017, Issue 11],192-196。

^② 谢建设 Xie Jianshe,谢宇 Xie Yu,〈新时代农民工在乡村振兴中的共赢机制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a Win-win Mechanism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甘肃社会科学》[Gansu Social Sciences],2018年第4期[2018, Issue 4],35-42。

^③ 张霁 Zhang Ji,〈以色列基布兹对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启示〉[The Enlightenment of Israeli Kibbutz on Solving China's Rural Problems],《国外农业》(农业经济与科技)[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Technology],2016年27(24)期[2016, Issue 27(24)],131-13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引到农村建设和发展中来。

第二,针对我国农村年轻人口流失与乡村空心化现象,基布兹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过疏,劳动力大量流失。^①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提速,城市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工”并逐步定居的模式,是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年轻人的“主旋律”。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又导致了农村生产力下降、儿童关爱缺失等新的问题。与乡村空心化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比率不断攀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速与规模要大于其他国家。农村老龄化人口数目远高于城镇,空巢老人数目较多,且农村老人的整体健康素质较城市老人要差,空巢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成了农村的一个“显问题”。

为解决相似困境,基布兹采取的办法是进行所有制与职业结构改革。通过改革,将一些原本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下放到个人与家庭身上。同时,为了改善贫富差距问题,基布兹实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基本保障与区别原则兼顾等措施,一方面鼓励原基布兹成员回归,另一方面吸引新成员加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其一,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这些手段调动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吸引因农业生产收入较低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回归农业。其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农村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农业技术人才对农民定期进行农业培训,提高农民的从业素质和知识文化水平。其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城市医疗、教育等资源的优质和便利程度。因此,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是吸引农村流失劳动力回乡的重要措施。

针对人口老龄化和老人的健康问题,基布兹十分重视老年成员的养老问题,并为此设有专门的养老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基布兹成员退休后可与其他退休成员一起居住在设施齐全的社区养老院里,享受免费的养老与医疗服务。在自愿原则下,基布兹会给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老人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手工制作、艺术创作等,使其继续为集体做贡献。在我国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中,可以以村居为单位成立敬老院^②或老人日常社交平台,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

① 胡智超 Hu Zhichao、龙花楼 Long Hualou,〈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国际经验借鉴〉[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China's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ference],《地理科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2011年第8期[2011, Issue 30(8)],1028-1036。

② 张霁 Zhang Ji,〈以色列基布兹对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启示〉[The Enlightenment of Israeli Kibbutz on Solving China's Rural Problems],131-132。



生活条件,用互相陪伴的生活方式来缓解老人的孤寂感和焦虑感。农村老人社区应当鼓励并组织老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手工制作或其他体力劳动,实现老人的社会价值,减轻社会养老压力。政府应当一方面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正确的科学指导,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村居养老院建设和养老院手工艺的发展,促使农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家庭养老观念发生变化。当然,加大社工人才培养力度,培育一批致力于农村养老事业的专业人员仍然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迫切需求。

第三,对于农民主体意识与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的问题,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是可供参考的做法。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但是目前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①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传统思想禁锢了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政策主体的参与力度。二是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没有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等限制而无法有效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去。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又受到了新事物和新思想的冲击,集体主义观念日趋淡薄。

针对集体主义观念和主人翁意识淡薄的问题,基布兹的做法是采用直接民主的管理原则,强调个人的奋斗只有与民族、国家和集体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基布兹通过相互合作的实践教育来促使成员,特别是年轻成员,在认识与情感上认同基布兹的价值意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切实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重视直接民主的实践,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实践来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对集体价值的认同。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才能使其感受并认同集体的价值,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为加强基布兹成员的价值认同教育,基布兹对教育系统进行了改革。在保障儿童基础教育的前提下,基布兹拓展了多种教育方式与教育渠道来提升成员的文化水平与专业技能,包括旅游教育、成人教育、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再就业教育等。我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与支持。从儿童基础教育和成人提升教育两个层面下功夫,来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与思想意识: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与教育,确保农村儿童普遍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多种方式的成人继续教育,建立丰富多彩的村居文化生活,以灵活多样的教育渠道保障村民进一步学习的环境。

^① 李迎生 Li Yingsheng、李文静 Li Wenjing、吴咏梅 Wu Yongmei,《社会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需要、模式与介入路径》[Social Work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Needs, Models and Intervention Paths],《学习与实践》[Study and Practice],2018年第6期[2018, Issue 6],78-8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综上所述,以色列的基布兹虽然没有直接建立国家政权,但它是拥有一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细胞’”^①。基布兹的创立、发展、改革与重生的过程为人类社会主义实践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尤其是在农业与农村建设方面。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于20世纪初首到巴勒斯坦地区时,迎接他们的主要是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沙漠与戈壁。基布兹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农业实践,为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20世纪最大的“农业革命”。^②20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以色列经济危机,对基布兹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巨大挑战,并促使基布兹针对危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革。从经济与社会成果上来看,基布兹的改革是成功的。然而,在肯定基布兹改革的有效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改革所引起的新问题,比如:部分基布兹为追求经济效率而造成了私有化过度;为迎合城镇居民乡村生活的需求及其带来的利益,有些基布兹利用集体土地进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改革后,也有的基布兹成员不直接参与劳动,雇佣工人来从事基布兹的农业生产。这种通过雇佣国外廉价劳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从而赚取利润的做法被看成是对基布兹传统价值理念的背叛。

总的来说,进入21世纪的基布兹基本发展成了以高科技农业为核心的绿色生态型社区。改革后的基布兹不仅创办了现代农业工厂,大力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发展基布兹特色旅游与特色教育。此外,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基布兹探索出了一条新型的集体主义道路,即集体主义的社区生活+互助合作的农庄合作模式。这是一种充分保持个人自由与权利之下的新集体主义,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制约与平衡的基布兹模式。以色列基布兹的改革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生产与效率的提高、职业结构改善、集体主义与基层民主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其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值得警惕。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段禄峰,魏明,《以色列基布兹农业合作社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世界农业》,2017年第11期。

^① 杨文圣 Yang Wensheng,《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对策》[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18年第6期[2018, Issue 6],70-74。

^② Dan Senor 丹·塞诺,Saul Singer 索尔·辛格,《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王跃红(Wang Xiaohong)、韩君宜(Han Junyi)译(北京[Bei Jing]:中信出版社[Zhongxin Publishing House],2010),108。



2. 胡智超、龙花楼,《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国际经验借鉴》,《地理科学进展》,2011年30(8)期。

3. 李迎生、李文静、吴咏梅,《社会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需要、模式与介入路径》,《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6期。

4. 杨文圣,《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对策》,《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5. 谢建设、谢宇,《新时代农民工在乡村振兴中的共赢机制建构》,《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6. 曾晓辉,《基布兹托起以色列》,《企业文明》,2000年第2期。

7. 张霁,《以色列基布兹对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启示》,《国外农业》(农业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27(24)期。

(二)外文参考文献

1. Amir 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2. Amir Helman, "The Israeli Kibbutz as a Socialist Model," *Th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Vol. 148, No. 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astern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Problems, March 1992.

3. Dan Horwitz, Moshe Lisak, *Metzuket B'utopia*, Tel Aviv: Am Oved, 1990.

4. Dana Shapiro, Moshe Stchwartz and David Pearlmuter, "Collectiveness, Remoteness and Isolation as Factors in Kibbutz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orizons in Geography*, No. 81/82, 2012.

5. Henry Near, "Experiment and Surviv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bbutz,"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0, No. 1, 1985.

6.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Menahem Rosner, *Future Trends of the Kibbutz—An Assessment of Recent Changes*, The Institute for Study and Research of the Kibbutz, University of Haifa, Publication No. 83, 2000.

8. Nir Tsu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ibbutz Social Capital, Voluntarism, and State-Community Relations: A Case Study," ECPR Joint Session of Workshop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April 2000.

9.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Shlomo Getz, "Processes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institutionalization—Among Israeli Kibbutzim, 1990-1998,"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August 12-16, 2000.

10. Stephen Charles Mott, "The Kibbutz's Adju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Ideological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Decline: Alternatives for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 Vol. 19, No. 1, Spring 1991.

11. Stanley Diamond, “Kibbutz and Shtetl: The History of an Idea,” *Social Problems* , Vol. 5, No. 2(Special Issue on the Kibbutz), Autumn 1957.